

发展实体经济，关键是找到创新的动力

■ 邵宇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其中实体经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实体经济不断升级和发展的过程。

但是，我国实体经济也长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这些问题令人担忧。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引起，既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关，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密切相关。

从内需消费水平看，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 年人均 GDP 为 5400 多美元，居民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质化、尖端化，企业现有的产品结构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从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多年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将要过去，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逐步递减，对我国集中在能源、基础原材料、工程设备等领域的实体经济来说，这个影响将会非常巨大。从出口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主要发达国家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实施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贸易保护主义也在不断抬头，这些都影响了我国外需的增长。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成本上升呈现长期化趋势，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依靠过度依赖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求发展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尽管我国实体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震荡有关，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有关，但从根本上看，这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自身的阶段性问题。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必须从实体经济自身寻找原因，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所以说实体经济既需要回归，但可能更需要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根基，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新形势下新要求下，实体经济如何发挥好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贡献，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付出艰苦的努力。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许多企业的产品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生产规模不小但利润水平



很低，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让我们付出了很严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也非常容易引起国际贸易的争端和摩擦，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分析世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特点与规律，紧紧抓住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一方面，要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围绕节能降耗、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创新研发设计，改造工艺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把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品比重提到新的水平，把附加值高的产品比重提到新的水平，特别是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企业在产业链的低端一哄而起，重复建设，盲目投资。

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世界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一批新兴高技术产业正在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应该积极抓住这一轮经济危机中的机遇，加大在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着力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抢占未来竞争的先机。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集中度

一个优良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一个产业有序发展、持续发展的有效保证。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存在市场布局结构散乱差、产业集中度不高、无序竞争等问题，很多企业盲目扩张、战线过长，投资效率低，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

这方面，德国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德国是世界上顶尖的制造业强国，很多产业往往是几家寡头企业作为系统集成商，集研发、设计等服务为一体，且有一大批专注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和根基，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于产业链上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这些产业链上的企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协调提升产业发展水平。这是符合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布局要求的。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布局，是一个系统工程，关系到我国实体经济能否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核心是如何积极稳妥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

目前，我们国家各个行业企业数量仍然偏多，企业平均规模仍然偏小，产业集中度仍然偏低，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整合产业链条，形成一批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大企业是行业的龙头和系统集成商，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头头羊，通过推进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协作，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带动产业链乃至全行业经济素质的不断提高。同时，积极发挥大企业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和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强自主创新，持续提升发展的内生动力

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这

些年，我国涌现出以载人航天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自主创新成果，但总体上看，在自主创新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许多领域的高端材料、关键设备、重要基础件、核心元器件等，仍然主要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很多产业已走过粗放式发展阶段，依靠模仿和西方技术转让已不再有后发优势，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小这一现实，使西方国家不会再真正转让给我们核心的、一流的技术。所以我国实体经济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转而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从跟踪者、竞争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式的发展。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能不缺资金，可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要充分发挥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作用，拓宽创新的视野。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内容。只有这些创新的要素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科研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给创新注入强劲的活力和动力。这方面，很多国外的创新氛围和体制值得我们学习。

积极走出去，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

实施国际化经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重要进展，许多企业采取直接投资、兼并收购、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走出去，在带动设备出口、劳动力输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开展国际化经营，从企业的角度讲，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企业在全球布局、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国际市场还缺乏深度的认知和全面把握，国际化运营能力和水平与世界一流企业存在很大差距。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不少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重，境外投资并购优质企业和资产的机会增多，这实际上是走出去的重要历史机遇。同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具备了一定的走出去的能力，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在走出去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通过并购、联合等方式，努力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知名品牌、研发人才、能源资源，增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

扩大对外投资，将国内部分技术成熟、国际市场需求大的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向境外延伸。扩大国外工程承包，带动国内设备、产

品出口和劳务输出，有效发挥和提升现有的生产能力；也要建立适应国际化经营的企业组织架构，完善境外投资的决策制度，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化经营中，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诚信经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保护当地环境，保护员工权益，积极参与所在国的公益事业，用好国际组织的舞台，努力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强化管理，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内功

提升管理水平是企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我国实体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中，我国企业在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但是整体上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国际知名大企业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从基础管理来看，许多企业虽然规模不断增长，但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一些企业还没有统一、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集团管控力不够，一些企业甚至处在管理粗放的状态。从管理创新来看，我国企业基本还处在模仿和跟随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要竞争力。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的机制，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必须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形成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科学决策的体制机制。必须加强管理创新，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完善和提升 ERP 系统，推进资金、采购、销售的集中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和管控水平，增强执行力。必须强化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健全规章制度和工作体系，完善工作流程和方法，提升内部工作规范化的程度，提高企业现代化的管理水平。着力建立更具活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机制。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的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大多处在实体经济领域，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很多的挑战。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做强做优、世界一流为目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作出贡献。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社会各界帮助，尤其需要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大力配合。衷心希望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工作继续给予支持帮助，国务院国资委愿和大家共同努力，积极推进实体经济做强做优，为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继续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2 年第 49 期）

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

■ 厉以宁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我认为要回归实体经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信心。

近年来，有一种论调影响了我们的企业家，也影响了很多入，即中国的红利已经没有了——人口红利没有了，当初是廉价的劳动力给我们创造了人口红利，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资源红利没有了，因为土地都用得差不多了，或者说土地越来越贵了；改革红利没有了，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但是它们的潜力渐尽，使用完了。

这使得实体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感到利润空间在逐步缩小，导致信心不足。一部分转移到比我们晚发展的国家去了，比如越南、柬埔寨、印尼等等，因为在那里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还有一部分就把资金转到了虚拟经济领域，因为实体经济领域准入门槛高，进入不容易，而虚拟经济没有这么高的门槛，什么炒股、炒房子、地下金融等都行；而且实体经济进去后退出难，虚拟经济既可以自由进入，又可以自由退出。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很大的企业，现在只是一个平台，并不从事很多生产，利用各种关系到银行取得贷款，然后在子公司从事地下金融的放贷。这对实体经济是非常有害的。

另外，资源红利没有了怎么办？改革红利没有了怎么办？这些都困扰着他们。

但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有新的认识。发展优势的丧失，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能总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要转型，新的红利才会产生。我们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正在产生。

新的红利正在产生

什么是新的人口红利？我们大量的技工已经成长起来，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就是

技工时代的开始。东南亚国家的技工水平不如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并不太大，但技工成本比他们低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将来东南亚国家的技工工时代怎么来办，那时候我们又前进了，从技工时代转入高级技工时代，将来再转入专业人才时代。所以说，新人口红利正在产生。

资源红利方面，新的资源红利跟旧的资源红利的区别在哪里？主要在科学技术上。要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就会产生新的资源红利。比如新能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海水淡化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问题。

改革红利方面，原有的政策到一定程度以后，潜力自然就发挥得差不多了，就需要有新的改革措施，新的改革措施出来以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自然就会不断产生。

当前最要紧的五项改革

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不仅民企，国企也一样。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家管什么？管国有资本。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考核、运营状况。国有资本的升值不比具体管理一个企业更重要吗？

还有什么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为什么 1979 年以后改革进行得这么快？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民间蕴藏的积极性靠什么？靠政府发现、调动、规范化，农业承包制就是一个例子。

这告诉我们，改革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所以实体经济的回归，重要的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到国外去投资或转移企业也行，但是要有新的认识，也不要灰心，要知道这不是中国将来的主要方向，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它认



为，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到 4000-5000 美元后就停滞不前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有陷阱，岂止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陷阱更普遍，很多国家长期停留在人均 GDP1000 多美元以下，这么多年没发展起来。大约 1.2 万美元以后，算高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到了 1.2 万美元以上，还不是一样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南欧的一些国家、日本。

实体经济发展靠什么？靠制度创新、产业升级。不仅实体经济要回归，还一定要转型。转型靠什么？真正要制度创新和产业升级，要靠一些强大的企业。要自主创新，要产业升级，就在于市场。中国一定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靠什么？扩大内需靠的，最重要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三个资本概念来解释。

第一个资本概念：物质资本，即货币投入转化为厂房、机器设备等。第二个是人力资本，技术、教育水平、经验、智慧。第三个资本概念是社会资本。这里谈的社会资本，并不是目前舆论经常提到的民营资本、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是个无形的资本，是人际关系，是人的

信誉。比如浙江人为什么生意做得好？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社会资本。浙江人到外国去发展，他的同乡关系、家族关系，和本人的信誉，都在帮助他，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这就叫社会资本。

但比较一下三种资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这三种资本都是弱的。比如，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我要创业，一抵押，钱就到手了。农村呢？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在宅基地上盖房子，不管盖得多漂亮也不能抵押，没有物质资本。所以，农村人除了空洞的、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权以外，土地、房子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很困难。

所以对农民来说，要增加他的物质资本，让他能够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则必须有三权三证。承包地、宅基地、房子都要有使用权和使用权证。土地确权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不能任意侵占，且便于土地流转，并在农村金融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步推广，这样农民就会富裕了。

人力资本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因为城市

的中小学，质量好、师资水平高、设备齐，而农村则不行。所以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和水平跟城市没法比，没有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方面，城里人要进入市场，朋友、亲戚、亲戚的亲戚，总能找人拉一拉、带带路。农村则不行，一个山沟里全是穷人，谁也没有闯过市场，找谁？

所以，要通过土地确权来解决农村的物质资本问题；通过教育资源有效配置来解决农村的人力资本问题；鼓励农民到社会去闯，鼓励他们办小微企业，慢慢积累来解决农村的社会资本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别，特别是城乡，还有第二个问题：二次分配有问题。西方人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来缩小差别。中国至少到去年为止，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为什么？社会保障的待遇不一样。比如教育经费的分布、文化经费的分布、医疗资源经费的分布，城乡的人均是不一样的，差距都很大。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农村才会越来越好。

此外，城镇化，中国要有中国的特点。在新的改革中，中国不能学西欧。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的，200 多年来把城市弄得贫民窟、工厂污染等，有钱人就往城外搬，穷人就进城，这是反城市化。中国更不能像它，8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里，那是不行的。假定中国将来有 15 亿人，80%就 12 亿人住在城里，中国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生活质量下降，谁愿意住在城里？

中国式的城镇化，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等于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老城区是多年以来形成的，要改造棚户区、工厂外迁，建设适合人居住的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就是开发区、试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着重点有二：一、公共服务到位；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如果上述方面都能做到，则我们不仅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将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仍然会不断地前进。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2 年第 49 期）